

从多声性看外交语言中问句的语义隐涵 及其推理机制*

鞠 晨² 袁毓林^{1,2,3,4}

- (1.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澳门 999078;
2.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3.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北京 100871;
4.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1)

提 要 本文以 2019 年 12 月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的发言作为语料, 对外交语言中的问句进行了多声性分析。分析发现, 外交语言中的问句为话语带来了复杂的多声现象和丰富的语义隐涵。这些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来源, 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并且, 依据一定的语用推理原则, 明确地否定了其中某些观点, 从而肯定了相反的某些观点。正是这种多声现象帮助塑造了外交语言既礼貌又有力的风格。

关键词 外交语言 多声性 询问/反问 语义隐涵 推理机制 礼貌原则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22.03.009

一、引言: 语言的多声性

Bakhtin (1984) 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 借用音乐术语, 创造性地提出了“多声性 (复调^①)” (polyphony) 的理论, 认为陀氏小说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了复调小说。与以往欧洲的“独白” (monologue) 小说不同, 陀氏小说就像由多个相对独立声部构成的复调音乐, 它们不再仅仅表达作者的某一种思想, 而是同时表现相对独立的多种意识, 整个作品是不同思想和声音的集合。同时, 他用“超语言学” (extralinguistic) 的观念, 在对话理论的框架下分析陀氏小说的语言组织, 认为陀氏小说中人物的话语常常包含了他人的声音与意识, 好像永远处在未完成的对话当中。陀氏小说也正是通过这种带有对话性和多声性的语言组织, 达到了“复调”的艺术效果。

Bakhtin 的多声性理论和对话理论对话语分析、互动语言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启

* 本课题得到国家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以自然语言为核心的语义理解理论、模型与方法”(项目编号:2020AAA0106701)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互联网+’的国际汉语教学资源与智慧教育平台研究”(项目编号:18ZDA295)的资助, 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发语言学者从对话交际的角度,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语言研究。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对语言的多声性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比如 Fløttum (2005, 2010 等)、Øyvind (2007) 利用 ScaPoLine (Scandinavian Theory of Linguistic Polyphony) 理论,从多声性的角度分析政治话语中不同观点(POV, point of view)的表达。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利用多声性理论进行语言研究,比如:许菊(2006)总结了多声性理论在语言学中的发展,并且从词汇、句法、语义语用以及语篇层面初步讨论了语言中多声性的表现;庞继贤、陈明瑶(2006)结合多声性理论,通过评价理论中的介入次系统分析了电视访谈中主持人介入标记语的使用,并讨论其人际功能;孟玲(2018)也借用类似的理论分析高校学生参加生死课以后的采访回答,以此分析学生参加课程之后的态度和行为改变;袁毓林(2021)也利用多声性理论和介入系统,分析了“王思聪假装在奋斗”的多声性现象,并讨论了“假装”的概念结构及其语用识解。

总体来看,学者对语言多声性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多声性在语言中的表现;二是利用评价理论中的介入次系统,讨论语言结构的人际功能,在此基础上分析具体的语言应用技巧或进行跨学科的讨论。在针对语言多声性的研究中,对否定和表示转折、让步的连词的讨论最多,否定、转折、让步也是语言多声性的重要表现^②。但是,除了否定和转折以外,语言中是否还存在其他多声性手段?语言的多声性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语言表达的?

我们选取外交语言作为语料来源,尝试探讨上面的问题。许多学者从语用的角度对外交语言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是分析外交语言的语言特征(郭鸿 1990;李战子、胡圣炜 2009 等),尤其是外交语言的模糊性(郭立秋、王红利 2002;李颖 2003;魏在江 2006;宁燕 2010 等);另一方面则是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语用原则的角度,对外交语言以及其中的外交技巧进行分析(马莉 2003;张悦、胡志清 2004 等)。通过上述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作为一种语言类型(或者说语体),外交语言有着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方面,外交语言在精确表达之余,还常常会故意进行模糊的表达;另一方面,外交语言的多种特点常常是由于遵守礼貌原则而造成的。

以往对外交语言的研究和讨论往往关注外交语言“对外”的特性,但实际上外交语言比纯粹的“对外”更加复杂。从多声性的角度来看,外交语言是一种典型的充斥着复杂的他人“声音”的语言类型:从说话人的角度看,外交语言常常是对某些国际时事作出回应,回应的内容中势必会包括被回应的“声音”。从听话人的角度看,在外交场合中,发言人代表国家的立场发声,其听众的性质又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这种语言显然是对外的,其听话者可能包括盟友、对手;另一方面,这种语言也会被媒体向国内发布,所以外交语言也同时是对内的,其听话者包括了国内民众。这样,外交语言在产生时就必然考虑到复杂的受众性质,受众当中可能存在的“声音”也常常会作为语句的某种预设而被包裹或镶嵌在外交语言中。这些复杂的“声音”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外交语言中,影响着外交语言的形成和相关外交形象的塑造。因此,本文从外交语言入手,来观察多声性对外交语言的塑造。

本文选取 2019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中^③外交部发言人主持的例行记者会记录,以及就某些重大事件的回应作为语料来源。其中例行记者会记录共 22 篇,就重大事件答记者问发表的讲话共 3 篇^④,共约 5.6 万字(除去问题)。

本文发现,在这些语料当中,问句的使用非常频繁。在我们收集的范围中,共出现了 89 例问句。本文将从问句入手,将上面的问题具体化:问句是否为外交语言带来了多声性?多声性对外交语言的问句产生了什么影响?

二、外交语言中的问句及其多声性特征

我们参考李宇明(1993)的分类,根据下面的三个标准,对外交语言中的问句进行分类:

- a. 问话人对所问的问题有无疑问;
- b. 问话中包含不包含答案;
- c. 问话人要求不要求听话人回答。

李文按照上述三个标准的回答,从使用上为问句进行了分类^⑤:

	a (有无疑问)	b (是否包含答案)	c (是否要求回答)	说明
甲	+	+	+	不存在
乙	+	+	-	不存在
丙	+	-	-	自我思考
丁	+	-	+	询问
戊	-	-	-	设问
己	-	-	+	提问
庚	-	+	+	证实问
辛	-	+	-	反问

表1 基于三个标准的问句分类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在外交语言中,有时候对标准c的判定是模糊的,这也是外交语言复杂的受众导致的:对于我们所收集的语料类型来说,听话人在表面上可能只是到会的记者;但实际上,外交部发言人真正要针对的听众群体却是复杂的。所以,很多问句中,问话人虽然不要求表面上的听话人(记者)回答,但却常常需要实际上的听话人(比如某个国家或其相关部门及人士)来回答。同时,从外交语言的功能上看,外交语言中不太可能出现真正的发言人“自我思考”的问句,也不太可能出现真正的用来“测试”听话人的“提问”。因此,我们对上面的分类进行整合,得到下面四类:

	问话人对所问的问题有无疑问	问话中是否包含答案	是否要求某人回答
询问	+	-	+
设问	-	-	-
证实问	-	+	+
反问	-	+	-

表2 外交语言中涉及的问句类型

根据这些分类标准,我们统计了我们所收集的语料中问句的使用情况:

	询问	设问	证实问	反问	总计
出现次数	37	11	7	34	89
比例	41.57%	12.36%	7.87%	38.20%	100%

表3 2019年12月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的问句使用情况

可见,询问和反问在外交语言中占到了绝大多数。下文,我们将以询问和反问为主体,讨论外交语言中问句的多声现象。

1. 外交语言中的询问

在我们收集的语料中,“询问”是出现比例最高的一种问句。Hamblin(1973)利用蒙太格语法的框架,分析了英语问句的语义。Hamblin认为,蒙太格语法的框架也能应用于英语中的问句,并可以结合集合论的思想,将问句的语义和陈述句的语义统一起来。比如Mary可以代表一个集合,集合中唯一的元素就是Mary; Mary walks也可以代表一个集合,集合中唯一的元素是Mary walks这一命题。同样,当用who来代替Mary,形成问句who walks时,就可以形成一个由多个命题组成的集合,可能包括Mary walks, John walks等等。从语用上说,问句引发了一个选择情境(choice situation),要求在一个命题组成的集合中进行选择。也就是说,问句的语义集合的成员就是问句的回答。而对于一般疑问句来说,在语义上,一般疑问句相当于在命题前加上了一个is it the case that的前缀。这样,一个一般疑问句(‘is it the case that’a)的语义也可以表示为一个集合,它只有两个元素,即a和a的否定。如果从多声性的角度来看上述语义阐释,就可以发现,问句的语义就是一个由多种声音组成的语义集合,这个语义集合为话语带来了鲜明的多声效果。

在外交语体下,在上下文语境的帮助下,发言人可以利用询问的多声性来达到特殊的表达效果。比如,2019年12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允许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企业参与一国5G网络任何部分的建设,都是不安全的,都将对该国公民的隐私、人权和安全构成重大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这一声明发出了下面的询问:

(1) 华为公司早已公开表明,愿意同有关国家签署无“后门”协议,也愿意接受第三方检测和监督。不知道美方能不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为了分析得更加全面,我们先来看询问句前面的陈述句。在这里,发话人引入了来自华为公司的声音。这样,在这句话中,其实包含了两种声音:

A1: 华为公司公开表明“愿意签署无‘后门’协议并接受第三方的检测和监督”。

A2: 华为公司愿意同有关国家签署“无后门”协议并接受第三方检测和监督。

Øyvind(2007)将多声性结构分为下面四个部分:

a) 发话人(the locutor),对其言语负责;

b) 声音(the points of view)^⑥;

c) 声源(the discursive beings-sources of pov);

d) 声音和声源的关系(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ov and the discursive beings),可以分为负

责 (complete responsibility)、无把握 (insecurity) 和反对 (disagreement)。

可见,在多声性结构中,重要的不仅仅是不同的声音,还有声音的来源以及该声音与声源的关系。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两种声音声源不同:A1 的声源来自于发话人,而 A2 的声源则是华为公司。发话人只对 A1 的真实性负责,即华为公开表明了某一件事;而华为公司作为 A2 的声源,对 A2 的真实性负责。

那么,为什么发话人要引入华为公司的声明,来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有关华为公司的声明呢?我们发现,通过语用推理,上面的声音还能推出更多的声音。许菊(2006)引入了 Sperber & Wilson (1995) 关联理论,认为“多声部结构的重建过程也是语境补足的过程”。在明示-推理交际中,“从话语的明说意义 (explicature) 推导出言语主体的真正意图,一般要经过两个步骤:先推导出隐涵前提 (implicated premise),再在隐涵前提的基础上推导出隐涵结论 (implicated conclusion),即言语主体的真正意图”。

显然,在这个回应中,引入华为的声明并不是发话人真正的意图,发话人真正的意图是要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声明。在关联性的指引下,听话人需要从发话人的明示中,推导出隐涵前提和隐涵结论,得到发话人的真正意图。根据常识,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隐涵前提:

IP1:无“后门”且愿意接受第三方检测和监督的企业,不会对公民的隐私和人权安全构成威胁;反之,则可能会对公民的隐私和人权安全构成威胁。

这样,通过上述隐涵前提,并结合发话人所引入的华为的声明(A2),我们可以得到隐涵结论 A3:

A3(IC):华为公司不会对公民的隐私和人权安全构成威胁。

这个隐涵的结论 A3 实现了发话人的意图,即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华为不安全的指责。而 A3 的声源是不明确的,A3 是听话人根据发话人的明示推理得到的隐涵结论。因此,A3 的声源是作出这种推论的听话人,而不是发话人。可见,作出推理的听话人为 A3 的真实性负责,发话人与 A3 并没有直接关系。

在这样的语境下,发言人发起了需要美国回答的询问:

不知道美方能不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这个问句中并没有包含问题的回答,并且问话要求美方或听话人回答。根据 Hamblin (1973) 对问句语义的分析,上述问句的语义集合中包含了两个成员,即 a(美方能作出同样的承诺)与 a 的否定(美方不能作出同样的承诺)。这样,上述的询问句可以分析为下面两种声音:

V1:美方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V2:美方不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发话人通过问句的语义集合,带来了意义相反的两种声音。但是,发话人只通过询问发起了选择情境,提供了意义不同的可选项,但却并不对任意一个可选项的真实性负责。那么,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说,在这个选择情境中应该选择哪一种声音呢?我们发现,联系前文的回答,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声音。我们将上文一并截取如下:

前天我已经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包括英国政府、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及欧盟委员会等机构经过多年审查都没有发现华为存在明显“后门”。相反,根据公开报道,多家美国公司,如思科、苹果公司等都存在安全漏洞,爆出过多起“后门”事件。臭名昭

著的“棱镜门”事件表明,在美国强大的全球监控窃听体系面前,即便是美国盟友的领导人和民众也是毫无隐私可言的。

华为公司早已公开表明,愿意同有关国家签署无“后门”协议,也愿意接受第三方检测和监督。不知道美方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在询问之前,发话人通过引入他者的声音(公开报道),给出了“多家美国公司爆出‘后门’事件”的信息,以及“美国拥有强大的全球监听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国家领导人和民众都毫无隐私”的结论。通过这样的背景,听话人可以继续在明示-推理交际中,通过一般常识,补充出这样的隐涵前提:

IP2:拥有强大的全球监控窃听体系的国家,就不敢承诺无“后门”,并接受第三方的检测和监督。

在这种隐涵前提下,面对发话人所给出的选择情境,听话人能够进行推理,在 V1 和 V2 中作出选择:

V3:V1 不正确,V2 正确。(IC)

与此同时,根据与上文陈述句同样的隐涵前提 IP1,听话人还能继续进一步推理,得到更加深层的隐涵结论:

V4:美国会对其他国家的公民隐私和人权安全构成威胁。(IC)

可见,这些隐涵结论,才能够形成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回应,才是发话人真正的会话意图。但是,从声源和声音的关系来看,V3 与 V4 的声源并不是发话人,而是听话人依靠常识以及发话人所给出的信息,通过语用推理得到的隐涵结论。因此,只有作出上述推理的听话人才是 V3 和 V4 的声源,为 V3 和 V4 的真实性负责;而发话人在整个过程中,只提出了询问,给出选择情境,并不为问句带来的任何声音负责。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个看似简单的询问句,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多层级的多声结构。它至少包含以下四种声音:

基本声音:

V1:美方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V2:美方不能作出同样的承诺。

隐涵声音:

V3:V1 不正确,V2 正确。(IC,由 IP1 推导得到)

V4:美国会对其他国家的公民隐私和人权安全构成威胁。(IC,由 IP2 推导得到)

其中,V1 和 V2 是问句表层的语义结构,是询问句本身所带来的、基本的声音。发话人是这两种声音的声源,但并不对这两种声音的真实性负责,而是创造了对这两种声音的选择情境。而 V3 和 V4 则不是该问句直接带来的声音,而是问句在特定语境之下,由说话人明示,听话人补充隐涵前提,并且进行语用推理,最后才得到的、问句隐涵的声音。发话人不是隐涵声音的声源,也不对两种声音的真实性负责。

在这样的语境下,问句之前的陈述完成了对美方声明的回应:发言人引入华为的承诺,引导听话人否定了“华为会对公民隐私和安全造成威胁”的声音^⑦;同时,用询问句完成了对美方的进一步反击:在这种特定语境下,通过听话人为问句提供的声音(即听话人推理出的隐涵结论),暗示美方才是真的威胁了公民隐私和人权安全,暗暗指责了美方“贼喊捉贼”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发言人对其真实性负责的声音是很少的。在问句前的陈述句中,发言人只负责“华为公开表明”的举动是真实的(A1),而华为是不是真的履行承诺由华为公司负责(A2的声源),华为是不是真的不会对公民的隐私安全造成威胁,则由作出语用推理的听话人负责(A3的声源)。

到了问句中,发言人提出了两种声音的选择情境(V1和V2),但是对哪种声音的真实性都不负责。而美国是否能作出同样的承诺(V3)以及美国是否会对其他国家公民的隐私和安全产生威胁(V4),也由作出语用推理的听话人负责。

然而,发话人真正负责的声音却并不是表达的重点;相反,正是那些由听话人语用推理得到的、由听话人负责的隐涵声音才是发话人真正的会话意图。这样,一方面,发言人通过他人的声音驳斥了美方的声明,并对美方进行了反击和谴责;另一方面,发言人又不对这些声音的真实性负责,没有留下话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询问确实能够给话语带来丰富的声音,是语言表现多声性的一种手段。询问本身的语义,可以被分析为一个由问句回答组成的集合,天生带有多声特征。与此同时,这些由问句引入的回答,还能继续和语境中的其他话语互动,经由语用推理,为话语带来更加复杂的声音。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询问的多声性正与外交语体的语用特征相契合。通过引入声音,模糊声源,由询问带来的多声结构能够让发话人在表达自己态度的同时,避免与这些声音产生直接联系,规避了发话人的责任,符合外交语言既精确又模糊的要求。正是这种复杂的多声现象,使得询问成为了外交语言中使用最多的一类问句。

2. 外交语言中的反问

在我们收集的语料中,反问是使用比例次高的问句。一般来说,反问句常常表达否定,能够对应一个相应地带有否定词的陈述句。在多声性分析中,否定常常作为一个多声性的标志出现。在一个带有否定词的陈述句中,可以直接得到两种声音。例如:

(2) 威胁恐吓讹诈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政策。

V1: 威胁恐吓讹诈(曾经)是中国的政策。

V2: V1 不正确。

否定引出了相反的两种声音,发话人对 V2 的真实性负责。

那么,反问句是否也能够直接得到这样两种声音呢? 我们认为,反问句的多声情况更加复杂,这是因为反问句产生否定意义的机制是相对复杂的。刘彬、袁毓林(201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反问句的性质和语用环境,认为反问句并不是真正的“无疑而问”,而是一种对方言论或行为的前提的质疑。其否定意义的生成过程表示如下:

反通常性语境(反常的现象) → 说话人表示非常怀疑,使用反问句,故意进行质疑
→ 怀疑:疑善信恶、疑有信无、疑是信非(①“不相信……”;②“相信……不……”)内置了否定性意义 → 推动反问句表示否定意义

可见,反问句的否定意义不像否定句,能够直接通过否定词在基本语义的层面表达出来;而是需要在反通常性的语境中,通过质疑的方式,来使得否定意义涌现出来。因此,反问句在语义结构上,与一般问句一样,都可以看作是由其回答所组成的语义集合。只不过,

说话人故意将问句放在反通常性的语境下,质疑甚至反驳了所有的可能回答,进而间接地表达了否定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反问句也呈现出了复杂的多声结构。例如,针对美国领导人“中国已非常强大,这很大程度上是利用美国的钱做到的”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中包含了这样的反问:

(3) 这个说法太可笑了! 环顾全球,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能力用钱来重建一个中国? 太可笑了! 中国发展的成就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什么人、什么国家恩赐施舍的,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勤劳、汗水、智慧和勇气干出来的。

从基本语义上来说,反问句与询问句的语义结构一样,都是一个由其回答而组成的语义集合。因此,上述反问句所引入的基本声音可以表现为下面的结构:

V1: 美国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V2: 日本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

V_x: 国家 x 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同一般问句一样,发话人通过问句提供了一个选择情境,并给出了从 V1 到 V_x 的不同声音作为可能选项。但是,与一般问句不同的是,上述所有的声音出现在一个反通常性的语境当中:一方面,是引发问句的美国领导人的言论;另一方面,则是发言人对于这种言论的评价——“太可笑了”。在这样的语境基础上,发话人极度质疑甚至否定“有国家有能力用钱重建中国”,并用问句的形式,表现出了这种极度的质疑和反驳。可见,与询问句为听话人提供选择情境不同,在反问句中,发话人自行对语义集合中的所有成员进行了选择:发话人质疑(反驳)所有的回答选项,从而认定该集合为空集。

在这样的过程中,反问句内置了否定意义:

V_m: V1 到 V_n 都不正确。(陈述义:质疑甚至驳斥问句所有的回答)

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到反问句的衍推意义:

V_n: 根本不存在哪个国家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由 V_m 得到的衍推义)

和例(2)的否定陈述句能够直接得到两种声音不同,在反问句中,问句的语义结构仍然是其回答的集合;因此,仍然能够引入 V1 到 V_x 的声音。但是,与询问不同的是,反问句出现在反通常性的语境当中,对问题的所有答案进行了质疑和驳斥,内置了否定意义。并且,从声源上来看,内置否定意义的 V_m 由发话人发出,发话人对 V_m 的真实性负责。在驳斥所有回答的基础上,V_n 的声音能够自然地衍推出来:如果所有的可能答案都不正确,那么就不存在哪个国家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这种声音(V_n)由 V_m 衍推得到,发话人对 V_m 的真实性负责,也因此,发话人同样要对 V_m 的真实性负责。

郭继懋(1997)总结了使用反问句的语义语用条件,并将反问句的意义分为两部分。除了字面意义以外,还具有隐涵意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引出发话人说出的反问句的行为 X“不合乎情理,是错的”。总含有这种隐涵意义,是“反问句在意义上与陈述句的根本区别”。而反问句的字面意义则是,X 的预设 Y 结合语境,我们知道,引出反问句的行为是美国领导人的言论,这一言论也笼罩了反问句,是反问句使用的条件。我们可以将这一声音记为 V0:

V0: 中国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美国的钱做到的。

同时,我们通过常识,能够得到下面的隐涵前提:

IP: 美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

这样,根据反问句的衍推声音 V_n ,还可以进一步得到下面的声音:

$V_a(IC)$: V_0 不正确。

V_a 是听话人通过语用推理得到的,其声源是作出这种推理的听话人,但是,这种隐涵结论与询问句的隐涵结论不同。在反问句中,衍推声音 V_m 否定的往往是 V_0 成立的前提条件^⑧,也就是说,当 V_m 为真时, V_a 一定成立。因此,在发话人对 V_m 负责的前提下,虽然 V_a 的声源并不是发话人,而是作出语用推理的听话人,但发话人要与听话人共同对 V_a 的真实性负责。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例(3)的反问句也具有复杂且多层次的多声结构。它至少涉及和引入了下面的多种声音:

前提声音:

V_0 : 中国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美国的钱做到的。

基本声音:

V_1 : 美国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V_2 : 日本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

V_x : 国家 x 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主观陈述声音:

V_m : V_1 到 V_n 都不正确。

衍推声音:

V_n : 根本不存在哪个国家有能力用钱重建一个中国。

隐涵声音:

V_a : V_0 不正确。

在这个多声结构中,前提声音是反问句存在的语用条件,反问句就是为了回应前提声音而存在的;反问句的基本语义结构引入了数个基本声音,它们为主观陈述声音提供了语义基础;在主观陈述声音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衍推声音,这一衍推声音才是发话人最终要表达的、占据主流的声音。在此基础上,听话人还能够经由语用推理得到反问句的隐涵声音,这是发话人真正的会话意图。但是,由于听话人进行语用推理所依据的前提条件(V_n)是由发话人负责的,因而,发话人也需要负责隐涵声音的真实性。

总体来看,反问的多声现象要比否定的陈述句复杂得多:一方面,反问句的句义不是靠直接否定他者声音得到的,而是经由“质疑→否定”得到的;另一方面,反问句还包含了隐涵声音,它是通过引入语境中的声音,再经过语用推理得到的。这样一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反问句的句义就成为了隐涵义的“论据”。通过引入复杂的多种声音,用反问句来否定和反驳比直接否定要显得更加强烈,或者说,具有更强的语力(force)。

与询问不同,反问句虽然也激活了语义集合与选择情境,但发话人却通过反通常性的语境以及其他各种手段,自己解决了选择情境。从发话人与声音的关系来看,在询问句中,发话人不对任何回答的真实性负责;而在反问句中,发话人却要对主观陈述声音、衍推声音乃至隐涵声音的真实性负责。因此,在表达的力度上,反问比询问更强。发话人放弃了规避责任,通过反问,将自己的态度充分地表达出来。

三、问句的多声性与外交语言风格

通过对外交语言中间句的多声性分析,我们发现,外交语言中的问句常常会带来复杂的多声现象。这是因为,在我们收集的语料中,发言人的发言一般是对记者提出的话题做出回应。这样,绝大多数问句的使用并不只是为了单纯地获取信息,更是为了表明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问句的回答作为基本声音被引入到话语中,而听话人则通过明示-推理等语用推理规则,来对这些回答进行选择。这一系列复杂的声音被打包进问句当中,构成了发言人真正的回应。可见,问句确实具备引入多种声音的功能,并且,也正是这种多声功能才使得发言人频繁使用这一形式来表达立场。

那么,为什么要利用问句的多声功能来表达立场呢?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这是为了符合“礼貌原则”。晏宗杰(2004)比较了反问句“V+什么+V”和相关句式的礼貌程度。他引用了Leech(1983)的礼貌级别(gradations)理论:语言形式越间接,话语就显得越礼貌;相反,语言形式越直接,则越不礼貌。殷树林(2006)也认为,反问句的语用价值之一是礼貌。反问句通过诱导的方式使听话人自己否定自己的立场、主张、行为,有利于“使对话双方的分歧减至最小限度”“使对话双方的反感减至最小限度”“最小限度地贬低别人”“最小限度地赞誉自己”。

从这些角度来说,问句的使用确实间接地表达了语义,满足了外交语言“礼貌”的要求。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从语感上又觉得这些问句的使用并不十分委婉,甚至是有些尖锐、强硬的,这种直觉似乎与“礼貌”相反。我们认为,这种矛盾也与问句的多声结构有关。

在外交语言的问句中,发言人常常能够借助他人的语用推理,来对可能的回答进行选择,间接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在这一过程中,发言人尽量寻求双方的共识,符合礼貌原则。可是,被引入的声音却可以是不礼貌的:它们既可以是对对方的反驳,也可以是对对方的指责。并且,正是由于这些声音被引入方式的间接性(明示-推理),这些不礼貌的声音反而显得更有凭据,并且有复杂而庞大的听者群(即所有进行了这种推理的人)为这些声音负责。

胡壮麟(1994)对新闻报道和论辩语体进行了可证性分析,发现论辩语篇使用较多的是基于假设性证据的“演绎”型证素,这正符合论辩语篇对说理和表达观点的要求。在多声性结构中,那些通过推理而得到的声音正是论辩语体中常用的“演绎”型证素。这样,以问句为形式的回应,通过引入不同的声音而具有了论辩色彩,因而能够作为一种论辩的手段应用在外交语言当中。这也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质询”能成为辩论赛场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可见,问句的多声性为问句带来了“礼貌”和“论辩”的双重色彩,这使得问句成为外交语言中表示否定、驳斥时的重要手段。它在保持间接性的同时,明确地表达了发言人的负面态度,避免了由于遵守“礼貌原则”而过多地牺牲立场表达。

四、小 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问句是外交语言中表达多声性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发言人通过询问引入多种可能的回答,并通过语境促使听话人进行语用推理,对这些回答加以选择,以此间接地表达发言人的立场并规避话语责任;另一方面,发言人还能自己通过反问,对可能的回答加以选择和否定,同时通过语境促使听话人进行语用推理,进一步否定引出反问句的行为或

话语,表达负面的事理立场^⑨。

同时,问句带来的多声现象也帮助塑造了外交语言既礼貌又有力的风格:一方面,声音的间接引入使得外交语言保持了模糊、礼貌的风格特点;另一方面,成分复杂的受话群体通过“演绎”推理得到话语中的隐涵声音,给外交语言带来了论辩色彩,增强了外交语言立场表达的力度。

注 释

- ① 这一概念在作为文学理论讨论时,多采用“复调”的译法;在语言学的讨论中,则一般采用“多声性”的译法。我们也按照这一习惯,在描述小说时,用“复调”;在描述语言特点时,用“多声性”。
- ② 比如,在 Fløttum (2005, 2010 等)、Øyvind (2007) 的研究中,都讨论了否定词 not 和连词 but 所带来的多声现象。在孟玲(2018)中,否定和让步也是“借言”中重要的两个部分。
- ③ 网址为: <https://www.fmprc.gov.cn/web/>。
- ④ 分别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谈话”“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特本赢得阿尔及利亚总统大选答记者问”以及“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安理会表决叙利亚跨境人道救援问题决议草案答记者问”。
- ⑤ 每种问句的具体说明见李宇明(1993)。
- ⑥ 为了和“多声性”的翻译相配,我们将这里的观点(point of view)译为“声音”。
- ⑦ 即美方发言人的声明中表达的声音。这一声音虽然没有直接从发言人的问询中体现出来,但却“笼罩”或者说“渗透”了整个回应,发言人的整个回应是在这一声音存在的前提下产生的。
- ⑧ 郭继懋(1997)、胡德明(2010)都有相关的论述。我们采用胡德明(2010)的表述,即说话人通过否定q的前提(prerequisite)来否定引出反问的行为p。这里的“前提”指必要条件。而对询问句而言,虽然在特定语境下,询问句也可以激发听话人进行语用推理,但这种推理只是听话人根据常识而认定的一般情况,推论所依据的条件和结论之间并没有这样严格的对应关系。
- ⑨ 刘娅琼(2010)总结了前人对反问句功能的研究,并结合对谈话语料的观察,认为反问句的主要话语功能是表达说话人的(负面)事理立场。我们同意这一观点。

参考文献

- 郭 鸿 1990 外交语言的语言特征,《现代外语》第4期。
- 郭继懋 1997 反问句的语义语用特点,《中国语文》第2期。
- 郭立秋、王红利 2002 外交语言的精确性与模糊性,《外交学院学报》第4期。
- 胡德明 2010 从反问句生成机制看反问句否定语义的来源,《语言研究》第3期。
- 胡壮麟 1994 可证性,新闻报道和论辩语体,《外语研究》第2期。
- 李 颖 2003 论政治外交场合模糊语言的功能及运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宇明 1993 毛泽东著作设问句研究,《中国语文》第6期。
- 李战子、胡圣炜 2009 汉英外交文献语言特点的功能语言学阐释,《外国语文》第6期。
- 刘 彬、袁毓林 2017 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语文研究》第4期。
- 刘娅琼 2010 汉语会话中的否定反问句和特指反问句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马 莉 2003 语用原则与外交修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第4期。
- 孟 玲 2018 学生个体内部多声性与视角转变——高校生死教育课考察,《语言学研究》第二十四辑。
- 宁 燕 201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中的语用模糊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邵敬敏 2013 疑问句的结构类型与反问句的转化关系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 史金生 1997 表反问的“不是”,《中国语文》第1期。
- 魏在江 2006 从外交语言看语用含糊,《外语学刊》第2期。
- 熊明辉 2006 语用辩论术——一种批判性思维视角,《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徐盛桓 1999 疑问句探询功能的迁移,《中国语文》第1期。
- 许 菊 2006 语言的多声性探析,《语文学刊》(外文版)第4期。
- 晏宗杰 2004 从“V+什么+V”看汉语表达的礼貌级别,《汉语学习》第5期。
- 殷树林 2006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袁毓林、刘 彬 2017 疑问代词“谁”的虚指和否定意义的形成机制,《语言科学》第2期。
- 袁毓林 2021 从语言的“多声性”看“假装”句的解读歧义,《语言生活研究》第5期。
- Bakhtin, M. M., 1984 *Problem of Dostovsky's Poetics*. Ed. and trans. Caryl 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løttum, K., 2005 The self and the others—polyphonic visibility in research artic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5, 29-44.
- Fløttum, K., 2010 EU discourse: polyphony and unclearnes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 990-999.
- Hamblin, C. L., 1973 Questions in Montague English.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0 (1), 41-53.
- Leech, G.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 Øyvind, G., 2007 The polyphony of politics: finding voices in French political discours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across Disciplines* 1 (2): 61-78.

The Implicature and Its Inference Mechanism of Questions in Diplomatic Languag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yphony

Ju Chen & Yuan Yulin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speeches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at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s during December 2019 as the material to analyze the polyphonic structure of questions in diplomatic language. We found that questions in diplomatic language have brought complex polyphonic structure and implicature to the discourse. These different voices express different opinions and ar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ccording to certain pragmatic principles, certain opinions were clearly denied while certain opinions were affirmed. Finally, we pointed out that it is the polyphonic structure that helped shape a polite and powerful style of diplomatic language.

Keywords: diplomatic language, polyphony, inquiry/rhetorical question, implicature, inference mechanism, politeness principle

版 权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